



抗战风雨中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 周 云 尚 伟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八办”）是抗战初期党在香港的核心领导机构，1938年1月初设立，1942年2月因香港沦陷结束工作，其间广泛开展宣传联络工作，积极发展华南抗日力量，周密组织省港大营救活动，出色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各项任务，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粤港地区持久抗战武装基础，保护在港文化民主人士，推动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层决策 慎重选人

卢沟桥事变后，尽管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决心和意志空前高涨，但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至1937年12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沿海诸港口或沦陷或遭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和联络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枢纽。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对日本的侵华行径态度暧昧，香港成为国内外各种势力角逐的特殊战场。经慎重考虑，党中央决定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利用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已经派出的其他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都是党内的资深重要人士，如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陈云、陈潭秋、李克农等。对于香港“八办”负责人的人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决定选派廖承志前往香港开展工作。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都是国民党著名元老，在国内各界和海外华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廖承志本人精通多国语言，海外联系广，社交能力强，由他负责香港方面工作有许多优越条件。

1937年12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

代表的周恩来在武汉面晤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提出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事宜。经卡尔协调，得到港英当局应允，但要求“八办”不得公开挂牌，以保持英国的中立国地位。1938年1月初，经先期抵港的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周密筹建，香港“八办”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设立，对外称粤华公司，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搜集国际局势信息，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恢复整合香港等地中共组织，领导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接收并转运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友人捐赠的抗战物资。廖承志为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参与领导，连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李默农、张唯一、乔冠华、罗理实等20多位同志先后以各种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为掩护在办事处工作。

纵横捭阖 同气连枝

香港“八办”成立后，即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以香港为阵地，顺应香港人民和海外华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扩大国际宣传，加强对民主人士、港澳著名人士、爱国华侨领袖及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建立各方面的统战组织。

1938年6月，在香港“八办”的筹划与协助下，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港成立。同盟成员中有许多中外知名人士，如国民党的孙科、冯玉祥，印度革命领袖贾·尼赫鲁，英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英国名人克萊·布思、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等，廖承志亲任执行委员兼秘书长。

为了团结更多在港文化界、出版界、新闻界人士，香港“八办”通过这些领域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共同组建抗日文化新闻团体，创办抗日报刊，开办进步书店，编演进步戏剧、电影。仅1938年至1939年间，就在香港新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等6个进步文化团体，新办《文艺阵地》等10多种进步刊物，还组织力量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并在国内外宣传发行。

此外，香港“八办”还与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建立良好关系，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不断增进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对共产党的了解与支持，促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其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就收到海外华侨汇款220万元及大量抗战物资。大批华侨和港澳青年舍弃安逸生活，涉险来到香港“八办”登记报名，经香港转至延安学习

或直接奔赴前线参加抗战。自1938年至1939年，经香港“八办”介绍转运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港澳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就达600余人。

为确保护送人员和转运物资的任务顺利完成，香港“八办”和内地“八办”密切协同，严密组织，开辟了抗战期间“香港—延安”的千里交通线。以1939年5月一次抗战物资转运为例，当时香港“八办”通过统战渠道采购了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牌卡车存放于越南海防，为及时将这批物资转运至抗战前线，由桂林、贵阳“八办”抽调的押车副官及20多名司机采取分程接运的办法，先将这批物资从越南运到我国广西凭祥，然后经桂林、贵阳、重庆、西安等“八办”的通力合作，最终成功运抵延安。香港“八办”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有力地增进了民族情感，凝聚了民族力量；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人员物资千里转运支援抗战，极大地彰显了四海一家、同气连枝的民族根脉。

筹建武装 抗敌保港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八办”高度重视抗日武装力量建设工作，积极领导协助中共粤港地方组织建立和发展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先后

建立东江、珠江、琼崖多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武装成为香港沦陷后持久抗战、保卫粤港人民的坚强力量，为粤港地区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

东江、珠江、琼崖地区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建立初期，面临物资缺乏等诸多困难，特别是缺少经验丰富的党员骨干。廖承志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延安派遣有作战经验的粤籍干部予以支援。中共中央结合实际先后派庄田、梁鸿钧、谢立全等军政干部分别到上述地区游击队担任领导，加强部队军政训练，提高作战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粤港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同时，香港“八办”还积极协调保卫中国同盟，动员捐款捐物，缓解游击队物资匮乏的困境。

香港“八办”还会同粤港地区中共组织，积极引领爱国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组建回乡服务团，支持华南地区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江、珠江、中区、西江、琼崖、南路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回乡服务团最多时达30个，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1939年1月，在香港“八办”及中共香港地方组织的支持和鼓励下，由南洋惠侨救乡会与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等爱国团体发起组织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县淡水墟成立，共有团员500多人，在

东江地区14个县市开展抗日活动。这些回乡服务团深入城乡、发动群众，建立民众自卫武装，有力地支持配合了粤港地区敌后游击战的开展。

省港营救 佳话流芳

1941年12月25日，港英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海上和港内交通，实行戒严，劫掠财物，搜捕抗日人士，150万香港同胞陷于日军刺刀铁骑蹂躏之下，被困在港的爱国文化人士、民主人士的处境更为险恶。

中共中央对这一情况极为关注，自日军侵略香港开始，周恩来就连续多次致电廖承志，指示他迅速将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抢救出来并转移至安全地区。1942年1月，在经过严密筹划和周密准备，香港“八办”协同粤港地方党组织、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展开爱国人士营救工作。香港“八办”抽调干部骨干分批带领爱国人士闯过日军哨卡和海上封锁，通过敌伪顽区的盘查和土匪的拦截，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脱离香港险境，抵达安全地区。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省港大营救”。

在营救出港的800多人中，不仅有著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沙千里、胡绳、梁漱溟等300多人，还有包括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的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等国侨民近百名，以及国民党驻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国民党高级官员余汉谋、吴铁城等人的多位家属。大营救极大地增强了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信心，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2年2月，随着营救行动的成功完成，香港“八办”的使命也胜利完成。

朱瑞的顽强斗争生涯

□ 朱一华

朱瑞（1905—1948），生于江苏宿迁，曾任中共长江局军委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等职。1948年10月1日，朱瑞在辽沈战役中壮烈牺牲，时年43岁，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他“把斗争作为自己的生命要素”，终其一生都在矢志不渝的顽强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功勋。

在追求真理中勇于斗争

朱瑞从小就有斗争意识。他在读村小时，幸运地遇到一位“曾与孙文共过奔走，带来不少革命党消息”的新派教师。这些消息让朱瑞心潮澎湃，萌发了“革命的冲动”。两年后，朱瑞进入县立高小，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他初步了解到“劳农俄国”“布尔什维克”等“革命的说法”，逐渐认识到只有斗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从此，朱瑞就立志做一名救国救民的革命者。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朱瑞以“一个激烈的突出的爱国主义分子第一次参加了反日政治斗争”，他积极地组织同学们一起检查商品、搜查日货，在苏北小镇掀起了日益高涨的反日爱国斗争。在朱瑞看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斗争的实践”。入读中学后，朱瑞挚爱《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对马克思恩主义有了基本认识。他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极力痛斥北洋军阀的暴政，大声疾呼“要救民族于危亡，还要革命，还要斗争”。1924年，朱瑞进入广东大学就读。经过一年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朱瑞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表面了解上升为深刻认同，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随着认识的提高，他更加自觉地向党组织靠拢，在校内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邹运动”，点燃了学校的革命火种，被称赞为“斗争的中坚分子”。

1926年，在粤区学委的推荐下，朱瑞前往莫斯科求学。由于“努力学习，富有正义感，关心国家、民族兴亡，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敢于面对面进行斗争”，他在1928年顺利地加入了

苏联共产党。朱瑞内心十分激动，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一生的共产主义奋斗生活之始……其实际意义是我已具体、明确地确定了人生斗争的方向。”在苏联学习期间，朱瑞积极参加反托派斗争，深刻认识到“不仅党外有斗争，而且党内也有斗争”。复杂的形势，磨炼了他顽强的斗争意志，激励着他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

在艰难危险中敢于斗争

1930年1月，朱瑞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但没能和党组织顺利取得联系。面对残酷的革命形势，朱瑞毫不退缩，只身投入到与白色恐怖的斗争中，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组织。3月下旬终于与邓颖超取得了联系，中央组织部很快就把他安排到中央军委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江局军委秘书长张慕陶身受重伤，长江局军委书记关向应请求中央派人接替工作。由于当时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计划暴露，武汉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前往武汉工作的个别同志出现了畏难情绪。危急时刻，朱瑞挺身而出，主动向组织申请前往武汉。临行前，他给人家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写道：“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这次去武汉，朱瑞明知充满艰难与危险，但他依然迎难而上。

朱瑞到达武汉后，协助关向应主持长江局军委日常工作。由于汉口区行动委员会委员宋惠和的叛变，武汉革命形势日益恶化，对我党地下斗争工作形成巨大威胁，大批干部接连被捕、牺牲。12月下旬，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纷纷撤离武汉，长江局和武汉市委的全部工作都交由朱瑞负责。在敌人的嚣张气焰前，朱瑞镇定自若地进行顽强斗争。自己的秘书也被捕后，他克服一切困难，独自一人将军委系统联系的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分批撤出武汉，使他们安全离开险境。在敌人的刀尖上，朱瑞一直坚持斗争到1931年2月才按照中央指示返回上海，结束了在武汉随时面临死亡的浴血斗争。

在重大考验中善于斗争

朱瑞在长征途中，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尤其是在面临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重大考验面前，他展现出高超的斗争本领。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党中央和毛泽东从红军自身生存发展实际和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大局出发，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然而，自恃人众枪多的张国焘却公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四处制造谣言、攻击中央，阻挠红军北上。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对他苦心孤诣的说服教育和真心挽救，召开分裂中央的阿坝会议，通过非法的“阿坝会议决议”，挑起一场性质极其恶劣、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斗争。在此关键时刻，朱瑞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地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向红一军团广大将士详细传达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的决定和精神。审时度势地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前的倾向。这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的主要危险。”他还坚定地告诉大家：“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推动抗日高潮的到来。”广大官兵听后“十分兴奋，一致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并表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跟党走”。经过朱瑞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统一了红一军团全体将士的思想认识，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围，坚定地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正如朱瑞自己所说：“反张国焘斗争是对我一个考验，开始就明确坚定的为中央路线而斗争……我个人自始至终坚持党的路线，从思想上巩固和团结了群众。”朱瑞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革命将师

渡江战役第一枪

□ 陈彩云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全面发起渡江战役之前，在安徽和县长江北岸的西梁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奉渡江战役总前委命令，率先打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御部署，牵制了敌人数万兵力，为我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战争进入最后一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主力已损失殆尽。但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在长江沿岸增派重兵把守，加紧构筑工事，并凭借海陆军联合作战的优势，建立了自吹为“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共军只有经不起几发地弹的木帆船，要想渡江那是做梦！”“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能渡过来？除非它是天兵天将！”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成立了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共100万人，分三个重兵集团，部署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长江北岸。根据总前委命令，1949年3月底，第90师万余人，进驻安徽和县西梁山北边的白渡桥待命，揭开了震惊中外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战役序幕。

西梁山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与芜湖的东梁山夹江对峙，隔江相望，合称为天门山，如一座天设的门户，扼守江面，地势险要。当年李白游此地后留下“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千古佳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重地。为确保渡江战役胜利，渡江战役总前委综合分析战场态势，明确指出：在抓紧渡江准备工作的同时，要以一定兵力，拔除敌人在长江北岸的重点布防据点，确保我军顺利渡江。西梁山作为国民党长江防线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是扼守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咽喉要地，攻打西梁山对于渡江战役尤其中路突破意义重大。因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指出：为扰乱敌人江防计划，迷惑敌人，减少我军真正的突破口处敌人的防守兵力火力，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略，由第39军第90师率先攻打西梁山，千方百计让敌人产生错觉，牵制敌人

的兵力火力，为主力部队渡江创造有利条件。根据敌人的防守配备，我军指挥部研究部署决定：以第269团担任主攻，第268团担任佯攻，同时第270团为师预备队，两三天内打下西梁山。“渡江战役第一枪”。1949年4月7日黄昏，第90师师部由白渡桥进入西梁山西北边指挥所，各团进入预定阵地，并立即排除地雷等进攻障碍，开辟进攻道路，组织火力准备进攻。8日凌晨3时，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的步枪、机枪等轻重火器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一排排手榴弹投入敌人工事内爆炸，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肉搏拼杀，国民党驻军很快溃不成军，纷纷向大陀山主峰逃窜，小陀山、卧龙岗阵地飘起了胜利的红旗，战士们在巩固阵地后向大陀山主峰发起冲锋。

面对我军的攻势，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凭借大陀山主峰地形优势疯狂射击，江面上4艘军舰、江对岸东梁山炮兵和数架飞机形成了海空交叉火力，向我军阵地和后方补给线狂轰滥炸。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指挥部立即对战斗部署进行了调整，补充物资人员，并根据战斗的发展，采取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10日晚间向小陀山守敌发动了再一次攻击，成功夺回失去的小陀山阵地，残敌逃往大陀山。

11日，敌方再次集中兵力、炮火、飞机对我军阵地发动凶猛攻击，整个山头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我军严阵以待，前仆后继，与冲上来的敌人作殊死的拼杀，击退了敌军的一次次疯狂反扑，战斗呈现胶着状态，异常激烈。天黑前，部队正准备向西梁山发起总攻，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因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战8天的临时协议，兵团部电令部队暂停进攻，回原地驻扎待命，西梁山战役至此终止。

“西梁山战斗是一场重要的牵制战”。西梁山一役，我军声东击西，敌人误以为解放军要打下西梁山，从西梁山渡江，并与敌军反复争夺，加深了敌人的错觉，敌人更加重视这一带的防御，调集了大批兵力火力进行防守围剿，我军从而成功迷惑和牵制了敌人，保证了兵团主力从获港、鲁港、三山镇等处的顺利强渡成功，并使固守西梁山的敌军遭受重创，瓦解了敌人的军心，最终完成既定主要任务——帮助主力

部队成功渡江，在我军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短短数天的西梁山战役是一场极为惨烈的大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慕萍、第269团一营营长范光和在内的人民解放军1500多名指战员，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大军渡江的胜利和江南的解放。为缅怀先烈的光辉事迹，激励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1952年起，党和政府在西梁山上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及革命烈士塔、馆、墓、亭、院等，供后人瞻仰怀念。

